

台湾革新协会与《台湾月刊》史事述论

郭 满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历史所,福建 厦门 510275)

摘 要:台湾革新协会前身为台湾光复同志会,由旅居大陆的台籍人士所组成,前期致力于台湾光复运动,组织并未公开化。抗战胜利后,因应台湾战后时局,更名为台湾革新协会,以励行三民主义、效忠国家、协助政府、重建乡土为宗旨,并创办《台湾月刊》(THE FORMOSAN MONTHLY)为台湾“复兴重建”建言献策。

关键词:台湾革新协会;《台湾月刊》;台湾光复

有鉴于台湾革新协会存续时间较短,前期又因组织活动隐秘的缘故,并不为外界所闻,仅在其创办的机关刊物《台湾月刊》中略有提及。《台湾月刊》(THE FORMOSAN MONTHLY)^[1]1945年创刊,1945、1946年各出版一期,登载了许多旅居大陆的台胞对台湾复兴与建设的认识,颇具典型性。大陆和台湾学界均未就此一组织及《台湾月刊》中的言论作过讨论,笔者以“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5)”收录之《台湾月刊》为主要参考材料,探讨台湾革新协会的组织活动状况。

一、从台湾光复同志会到台湾革新协会

据1945年《台湾月刊》创刊号《记事栏》刊载《台湾革新协会之缘起及近况》一文所言,台湾光复同志会以台湾光复为职志,截至更名为台湾革新协会为止,一直处于隐秘的、不公开的状态,台湾有识之士,莫不爱慕祖国,其推行光复运动,埋名实干,既经多年,兹以宿愿获偿,故于八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时,由廖文奎先生发起,开初次坐(座)谈会,决定公开成立组织”。^[2]廖文奎在《台湾光复同志会宣言》中亦称“本会同志,多年推行光复运动,埋名实干,以至今日,兹特公开成立组织”。^[3]对于此前台湾光复同志会的其他史事未有提及,可以肯定的是,台湾光复同志会是由旅沪的台湾人所组成,以“光复台湾”为奋斗目标,在1945年更名“台湾革命协会”之前已经活动了几年时间,组织结构和活动均未公开。

1945年8月由廖文奎组织发起座谈会,决定公开成立组织,将台湾光复同志会正式更名为台湾革新协会,揭橥“以民众之立场,在政府领导之下,努力国族之复兴,从事乡土之建设,务使数百万台民成祖国之好公民,为祖国之生力军,庶乎无负祖国光复吾台之旨意”。^[4]台湾革新协会是台湾光复同志会应对战后时局,及时调整的结果。作为台湾革新协会重要言论阵地的《台湾月刊》,在其《投稿简则》中阐发创刊目的时明言“台湾革新协会鉴于抗战胜利,台湾归还祖国,今后复兴与重建工作还极艰巨,应兴应革,种种问题有所建议起见,特创办本刊以作公开研

作者简介:郭满(1990~),男,山东临沂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所在读博士。

讨之园地”。^[5]

二、台湾革新协会的组织结构及活动

台湾革新协会在 1945 年公开成立后,相继完善组织结构,通过简章选举产生了领导机关委员,具体如下表一所示:

表 1:台湾革新协会的组织机构

组织机关	委员名单
临时执行委员	廖文奎 王丽明 施石青 林少甫 颜春安 郭星如 吕永凯 陈炳煌 谢若叶
临时监察委员	王钟麟 张芳洲 谢有德
常务委员	廖文奎 林少甫 王丽明

台湾革新协会下设研究部、宣传部、训育部、联络部、妇女部等,各部在职能方面各有分工。研究部“每月开会一二次,检讨各种紧要问题,例如‘台湾光复之意义’,‘台湾革新之目标’,‘宪政与自治’等类”。^[6]宣传部则主要由王丽明负责编辑出版《台湾月刊》,“不久拟开始讲演及播音并组织歌剧团等工作”,时有关注台湾问题者致函邀请革新会派员前往演讲。联络部由施石青、郭星如、王大昭三人负责,妇女部则主要是谢若叶“倡导台湾女性各项革新问题之研究”。^[7]廖文奎与吕永凯执掌训育部的工作,不仅限于培训台湾义勇队第三支队的思想教育,同时担负旅沪台胞子女的教导:

廖文奎及吕永凯二位先生教导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台湾义勇队第三支队训练班。该班学员,近百名,大都系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生回国未久,故张队长,尤注重精神训育。吕先生乃警政专家,曾执教于燕京大学及中央军校,现在该班,担任《三民主义》课程,颇得学员崇仰。廖先生系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前金陵大学哲学教授,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央军校政治教官,中央政校政治研究院,现在该班以其在中央军校所著教程《人生哲学》为课本讲授人生哲学,藉以矫正思想,各学院莫不踊跃听教。又有交通大学化学教授颜春安先生,曾在该班,演讲《科学文化》《科学战争》及《科学建设》等题。关于旅沪台胞儿女之训育,有林少甫先生极力与各方人士提携,筹备幼稚园及中小学之组织。^[8]

1946 年出刊的《台湾月刊》新年号《记事栏》中,再次总结了近期台湾革新协会的相关活动。光复后旅居大陆的台籍人士多寻机返回台湾,台湾革新协会中的成员多有被聘为政府职员者:陈炳煌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所聘、曾为台湾省党部上海站站长的施石青为粮食部所聘、原交通大学颜春安与黄青剑为工矿处所聘。研究部决定提倡并出版系统的学术研究著作,如李淇先《台湾概观》、黄青剑与谢有德《台湾产业考察》、吕永凯《三民主义捷径》、廖文奎《人生哲学》。王丽明同时拟筹备“革新医学研究所”,延聘曾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求学的赖沂浴主持。宣传部注重国际宣传方面的工作,廖文奎的英文著作《Whither Formosa》即将付梓,约两万两千字,将在美国杂志上刊载,另有《Formosa:Its Historyand Geography,Racesand Cultures》也在写作计划中。其中,为调和旅沪台人与政府关系起见,会员林少甫建议旅沪台胞贡献台产大理石于上海市胜利门的建设。吕永先生继续在台湾义勇队第四支队训练班,教授《三民主义》,廖文奎在该训练班讲授《民训要义》《人生哲学》两课程。^[9]1946 年的台湾革新协会与 1945 年相比,更实质性的参与到台湾建设事业中,有更多的机会切实体会战后台湾的政治、经济实际,这切实

地影响了《台湾月刊》中的议题转向。

三、《台湾月刊》与台湾的复兴建设

《台湾月刊》是台湾革新协会在台湾光复后,由旅居上海的台籍人士以“复兴与重建”台湾为目的所创办,订阅《台湾月刊》的多为“沪上人士及机关之关心台湾问题者”。^[10]据1946年《台湾月刊》新年号发表的文章——《台湾革新协会之近况》言称,创刊号发行二千册,“于一星期内销尽,购买者乡亲、外省各半”,并计划“第二号当多印一倍,以供大众之需”,^[11]可见该期刊的影响力不仅局限在上海一地。《台湾月刊》前后出版两期,1945年创刊号一期,1946年新年号一期。创刊号上之文章发刊于光复初期,旅沪台胞多未有在台实际体验,抱持一种“理想主义”心态;待新年号发刊时,多数旅沪台胞已经返台,目睹台湾实况,前后两期所关注的议题,遂有明显的差别,借此可以一探台湾民众的心理转变历程,以及台湾政治生态的发展进程。

《台湾月刊》创刊号中刊布《投稿简则》,规定稿件范围为“国际问题,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文艺以及台湾暨侨务边疆等问题”^[12],实际上仅专注于台湾问题。发刊辞中也有相似表述,称欲恢复被日本压制的言论出版自由,“专俾台胞吐露苦衷,交换意见,庶几祖国人士,对台湾获真确认识,具热诚同情”。^[13]窥诸在《台湾月刊》上所刊发的文章,1945年创刊号上的文章多着眼于对台湾光复后的建设议题的讨论,以及有关台湾各项信息的调查;1946年新年号上所刊布的文章除了延续第一期的传统而外,相关政治议题明显有所增加。

(一)对台湾国民性的认识

台湾战后重建,最为国民政府所关注的是台湾人的“国民性”问题,期刊文章纷纷著文讨论如何再造台人国家、民族意识问题,焦点聚集在教育问题上。《台湾月刊》创刊号中共有四篇文章讨论了台湾人的“国民性”问题,分别为:苻伊《台湾同胞到底给日本同化了多少》、矢的《台湾无汉奸?各人要自省》、齐铁恨《由国语推行谈台湾光复》、谢友德《过度期台湾教育的我见》。整体而言,上述文章均关切被殖民统治达半世纪之久的台湾同胞对祖国的忠诚度问题,除了表达对台湾同胞的同情而外,坚持认为延聘大陆籍教师赴台教授国文是必须的,并将此作为重塑台湾民众“国民性”的重要途径。质疑台湾同胞的国家、民族意识,是出于对日本长期对台施行“同化”政策的顾虑,也是中日敌对历史场景下的特殊产物。苻伊在《台湾同胞到底给日本同化了多少》一文中开篇直陈“台湾人到底给日本同化了多少”的问题是以后对台湾决策各种问题时“一件非先检讨不可的问题”,认为“台胞的国家意识是属于日本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是属于中国的”,光复后“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可以一致了”,^[14]至于台湾同胞是否已被同化为日本国民的问题,作者从血统、语言、生活(包括衣、食、住)、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论证,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然而,隐含在论述背后的一个预设逻辑是,台湾民众需要重新被“教育”,培养丧失掉的对中国的国家意识。谢有德所著《过度期台湾教育的我见》的文章中,固然并未直言台胞的民族国家意识问题,然在回顾日据时期台湾教育的过程后也称,台人备受日人“奴化”,“禁止台胞学习国文”,“俾为台胞学习日语”同时不能享有和日人同等的入学机会,因此建言在过渡时期要加强国语学习,“非聘请优秀的平籍教员不可”,台籍教师“没有民族国家认识者,必须淘汰,可以继任者,担任国语国文历史以外各科”,每天课后要“听讲国语国文讲义二小时,经过一年后,一律考查成绩,及格者继续任用”,“为整肃民族国家精神起见,小学及中学等学校的日人教员,一律不许留用”。^[15]《台湾无汉奸?各人要自省》一文从正面回应台湾“汉奸”问题,首先认为台人作为日本的“附庸民”“所做的一切对祖国敌对危害的行为”是“情有可原的”;其次认为台湾得以

光复,台胞是“一个不劳而得的胜利者”,希望台胞“多做些阴德而补之”。^[16]归结起来,一概否认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运动,对于台湾同胞在大陆的抗争也视而不见。齐铁恨在《由国语推行谈台湾光复》文中也提出,“对于台湾同胞之回归祖国,尤注意其国语教育”。^[17]这样的讨论与国民政府的思虑不谋而和,陈仪对台湾收复后计划的第一要义理应教育:

台湾收复以后,应做工作自然很多,但弟以为最重要的一种却是教育。台湾与各省不同,它被敌人占据四十九年。在这四十九年,敌人用尽心计,不断施行奴化教育。不仅奴化思想而已,并禁用国文国语,普遍地强迫施行日文日语教育……受日语教育者,几占人之半数,所以台湾五十岁以下的人,对于中国文化及三民主义因而大多没有了解的机会,自然是茫然。这真是十分危险。收复后,最要紧的是根绝奴化的旧心理,建设革命的心理,那么,为主的就要靠教育了。^[18]

曾任台湾省党部主委的翁俊明在《改造台胞国民性之意见》中态度鲜明地指出台人“团体组织力弱”有损“整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提出从语言改良、倡导中华礼教等方面“改造”台人“国民性”。^[19]这与台湾调查委员会所拟《台湾接管计划纲要》通则第4条的规定相契合,“接管后之文化设施,应增强民族意识,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机会,提高文化水准”。^[20]职是之故,无论是旅居大陆的台籍人士,抑或是官方,都主张“重塑”台胞的“国民性”,这一观念对此后台湾社会稳定、政治生态进程影响至深且广。

(二)筹备台湾的复兴建设事业

如上所述,有关台湾“国民性”的议题告一段落后,顺次要解决的就是战后台湾的经济复建任务,《台湾月刊》创刊号中为此也进行了大量的材料搜集、整理工作。执掌《台湾月刊》编辑职责的王丽明在《台湾光复后的新使命》一文中,在回顾了台湾被割让、压迫的历史后,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台湾光复后的建设任务大纲:第一,教育的重建和思想的改造;第二,确立民主政治;第三,人力资源贡献祖国;第四,巩固国防开发产业;第五,保持固有美德,完成建国任务。^[21]黄青剑、谢有德合编的《台湾产业之考察》颇具代表性。该考察报告分为四篇,分别为:台湾对外贸易、台湾制糖工业、台湾特产物资(包括茶叶、香蕉、樟脑、稻米等)、台湾矿产业,每篇下又展开详尽论述,并附有表格若干,涵盖了台湾的主要经济部门,为光复计划得以开展奠定了基础。同期刊物上还载有林荣贤所撰《台湾工业方面技术者概况及将来方针》一文,对台湾诸多工业部门均有简略介绍,并建言“应以所有设施为基础,培养技术者,并善用现有技术者之能力,使台省工业充分发展”,与此同时“增设高工及中等工业学校以养成人材”。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还提到了工厂经营采用股票制,“由官厅督责”,避免“全官营事业”“摒弃一切官场恶习”“免被官僚专制或政商营私舞弊”。^[22]在台湾光复计划中,提出摒除官僚专制、政商舞弊的陋习的言论,尚属首次,不幸的是台湾行政长官并未采纳。

(三)台湾政治议题的萌发

若说《台湾月刊》创刊号中旅沪台籍人士尚沉浸于台湾光复的兴奋中,为台湾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复兴建言献策;到1946年《台湾月刊》新年号的言论中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开始关注台湾未来政治走向,也开始出现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言辞,这些情绪可以视为台人对周遭社会境况的真实反映。王丽明在《怎样才能配合新台湾?》文中表示,“国土重光,已完成了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了”,建议“对于民权训练加以正确的指导,民权实施并无困难”,可见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到台湾政治规划上来,对国民政府战后接收乱象的意见也更鲜明的见诸报端。

1946年《台湾月刊》新年号首篇即刊登由台湾旅沪同乡会撰述的公告——《为旅沪台胞伸冤》,直言上海区处理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的决议有失公允。该决议称,“凡属台湾及朝鲜之公

产,一律收归国有,至于台湾人民之私产,依照行政院颁布处理敌伪产业办法予以接管,但如能提出确实籍贯证据,并未担任日军特务工作及其他罪行者,其私产可予发还”,并申令“尽速遣送全部台民返其故乡”“不能仍留内地,或要求转籍与寄籍”。^[23]旅沪同乡会辩称,此种规定无异于将台胞“均以敌伪相待”,是以“莫须有”之说辞对台胞的戕害,滞留上海仅是私产“变卖未能,欲归不得”之故,此文亦已呈请中央政府。“台奸”“台产”问题是牵动台胞神经的敏感问题,光复后国民政府在大陆、台湾接收中混乱无章,无可避免的侵犯了台湾人的财产利益,伤害了台湾民众的感情,更进一步导致了台人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危机。在《冷语》栏目中更陈举四项政府接收乱象,言辞极为讽刺:

一,日来政府驻沪接收机关,常以台胞身份未明文确定之前,暂以敌产处理,这种措置,虽说是权宜应变之策,但受处理者,亡羊多岐,莫衷一是;

二,台湾省贸易公司,不问其内容如何,假使为统制贸易机关者,当此民主国胜利伸张之际,应以台湾省民为中心贡献解放后的台胞才是;

三,国军接收后的台湾,民众群起反对宴会政治只会吃,不会做,打倒为虎作伥的帮凶,“御用绅士”这是纯洁的民声;

四,上海旅沪的同乡,也有不知好歹的败类,竟敢,拘结“腐败线索狼狈护奸”肆意中伤诬指过去不为,日本走狗者为中派共产党,这种同乡居心叵测,不言而喻。^[24]

上述四则表述实质上是台湾民众对国民政府,以光复接收为名,行剥削腐败之实的抗议。此外还有一则转载《大公报》有关《法官犯法》的报道,内容为“司法行政部派赴台湾接收司法之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蒋慰祖,贪污有据,被长官公署拘留查办,并拟押解返渝。”^[25]转载这一讯息,当是有意为之,意在表达接收过程中的贪腐乱象。《平津通信》刊布了吴三连寄与蔡培火的信件,对光复后台胞的生活境遇做了如下描述,“关于同乡素供职日本机关者,自和平恢复后,失业颇多,商业停顿,物价高涨,生活艰难,希望回籍者甚众”。^[26]在《台湾通信》栏目中有文称,“省营事业范围相当大。商工业界抱不满,纷纷主张自由经济。但统制仍继续推行。”^[27]光复后台湾民众生活、商业未见好转,反而日趋恶化,与之明显对比的是接收官员生活的“醉生梦死”之态。在《拾零》栏目中,有戏谑的叙述称:“重庆出来的人们,都是宝贝——看来颇忙于酬酢,这也许因久别重逢并且持有八年抗战的功劳,人们都欢喜请他们吃胜利的酒的。”^[28]上述嘲讽之语,直接表达了对战后政府接收的不满,这种情形此后并未见好转,台民一度称台湾战后“接收”为“劫收”,官民矛盾不断郁积,“二二八”事件实则是这种愤懑情绪的总爆发。廖文奎在台湾光复同志会、台湾革新协会中的影响亦不容忽视。“二二八”事件后,廖文奎在《为二二八惨案呼吁!——台湾解放之管见》中陈述事件爆发首先是由于负责接收者“每抱君临异族之气概,到处欲称孤道寡”,并认为台人受日人“奴化教育”极深,不肯重用;其次是“接收及行政人员,多系贪污之流”,以搜刮为能事,特别是专卖贸易两局,“实则不过贪污舞弊之大本营”,并陈请中央:(一)撤办陈仪;(二)派员彻查惨案始末;(三)取消专卖贸易两局;(四)组织过渡省政府;(五)令组省民代表大会以制定省自治法。^[29]

从以“光复台湾”为目标的台湾光复同志会到以“复兴建设”为旨趣的台湾革新协会,体现了台湾同胞以光复故土为职志,并致力于战后台湾建设的夙愿。台胞抱持“理想主义”创办《台湾月刊》为台湾战后复兴出谋划策,并曾同政府站在同一立场,均认为有重塑台湾“国民性”的必要。随着时局的转变,国民政府的腐败日益显露,无论是驻留大陆的台胞,还是回归台湾者,无一不陷于行政当局的残酷剥削之中。一度被台湾同胞称誉的国民政府的抗战功绩,逐渐演变为国民政府、行政长官公署以“胜利者”姿态压迫台人的合理借口,抗战反而成为“原罪”。台人

对国民政府、长官公署的态度转变,具体的表现在《台湾月刊》前后两期议题的变化上,然而行政当局并未重视台胞政治改良建议,官民矛盾聚积,这也成为“台独”思想萌生的源流之一。

注释:

- [1]与此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主办的《台湾月刊》并非同一刊物。
[2]《台湾革新协会之缘起及近况》,《台湾月刊》创刊号,1945年,第31页。
[3][4]《台湾光复同志会宣言》,《台湾月刊》创刊号,1945年,第1页。
[5][12]《投稿简则》,《台湾月刊》创刊号,1945年。
[6][7][8][10]《台湾革新协会之缘起及近况》,《台湾月刊》创刊号,1945年,第32页,第30页。
[9][11]《台湾革新协会之近况》,《台湾月刊》新年号,1946年,第一卷第1期,第31~32页。
[13]《发刊辞》,《台湾月刊》创刊号,1945年。
[14]符伊:《台湾同胞到底给台湾同化了多少》,《台湾月刊》创刊号,1945年,第19~21页。
[15]谢友德:《过渡期台湾教育的我见》,《台湾月刊》创刊号,1945年,第25~26页。
[16]矢的:《台人无汉奸?各人要自省》,《台湾月刊》创刊号,1945年,第30页。
[17]齐铁恨:《由国语推行谈台湾光复》,《台湾月刊》创刊号,1945年,第25~26页。
[18]《陈仪致陈立夫函》,1944年5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胜利前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准备工作档案史料选》,《民国档案》,1989年第3期,第20~21页。
[19]翁俊明:《改造台胞国民性之意见》,《热流》,1945年第2期,第131~133页。
[20]《台湾接管计划纲要》(1945年3月),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49页。
[21]丽明:《光复后的新使命》,《台湾月刊》创刊号,1945年,第3~4页。
[22]林荣贤:《台湾工业方面技术者概况及将来方针》,《台湾月刊》创刊号,1945年,第17~19页。
[23]《为旅沪台胞伸冤》,《台湾月刊》新年号,1946年,第一卷第1期。
[24]得风云:《冷语》,《台湾月刊》新年号,1946年,第一卷第1期,第29页。
[25]《法官犯法》,《台湾月刊》新年号,1946年,第一卷第1期,第32页。
[26]《平津通信》,《台湾月刊》新年号,1946年,第一卷第1期,第32页。
[27]《台湾通信》,《台湾月刊》新年号,1946年,第一卷第1期,第31页。
[28]强心:《拾零》,《台湾月刊》新年号,1946年,第一卷第1期,第29页。
[29]廖文奎:《为二二八惨案呼吁》,《前锋》,1947年,第14期,第5~7页。

[责任编辑 蔡惠茹]

On Taiwan Reforming Association and *The Formosan Monthly*

Guo Man

Abstract: The Taiwan Reforming Association, formerly known as Taiwan's comrades, was composed of Taiwanese settlers who lived on the mainland. They were committed to the Taiwan Restoration Movement and its organization kept secretly.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in response to the post-war situation of Taiwan, the organization changed its name as the Taiwan Reforming Association, to inspire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loyalty to the country, to assist the government, to rebuild the country for the purpose, and publish journal of *THE FOMOSAN MONTHLY* for Taiwan's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aiwan Reforming Association, *The Formosan Monthly*, Taiwan Restoration